主编：王珺 编辑：王珺 见习编辑：董嘉程 设计：聂磊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深度解读

从好老师形象探索教师成长的秘密

杨扬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根本在于教师。”兴国必先强师，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号准教师专业发展的“脉”，找到教师专业发展的“关节”，在此基础上探索教师成长的可能路径，成为常议常新而当下尤为迫切的时代命题。《好教师形象与教师成长机制研究》（汪明帅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基于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判断，摆脱当前从单一的关键特征（专长）或影响因素研究教师发展的桎梏，从好老师形象这一“关节”入手，系统建构了基于好老师形象的教师成长机制，为打造高质量、专业化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好老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可能。

视觉中国 供图

从课程价值观念切入，为好教师形象定锚

随着“四有”好老师的提出，好老师形象日益成为当下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话题。毋庸讳言，好老师形象是教师研究中一个具有统领性的概念，反映了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折射出特定时代和社会赋予教师的期望，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举凡教师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以及队伍建设研究，背后无不隐含着一定的好老师形象，建立在特定好老师形象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纳入到好老师形象这一概念框架之中，有关教师的研究才有生长的基点。

不过，基于怎样的视角分析好老师形象，见仁见智。已有研究显示，不少研究者偏好从学生的角度对好老师形象进行研究，大多采用问卷对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形象进行调查。每个学生心目中都有关于好老师的形象，以调查的方式从学生的角度描绘好老师形象，易于操作，也能够整体了解学生对教师的期待。问题在于，好老师形象的研究主要在于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指导，从学生角度研究好老师形象，难免受到学生特性、喜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相当主观成分。事实上，已有研究也表明，不同年级、性别、成绩的学生心目中好老师形象存在明显差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功能的发挥。基于麦克唐纳（McDonald，J.P.）的“疯狂三角”（wild triangle）理论，本书从“课程价值观念”这一视角审视好老师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强调，课程是教育的核心，也是教师专业生活的重要构成，与教师有着天然的联系，是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更重要的是，课程负载着当今及未来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这主要体现在课程概念本身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教师与课程关系的改变上。特定的课程价值观念，意味着课程概念本身的发展程度，以及相应的教师与课程关系，对好老师形象起到了规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课程价值观念视角探究好老师形象就尤为切中肯綮，是有效发挥好老师形象研究指导功能的重要一步，不仅有学理上的必要，也反映了深刻的实践需求。基于此，本书从课程价值观念变迁视角对好老师形象展开研究，为好老师形象的探索重新定锚，探讨在课程发展中教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课程发展允许教师在课程领域有什么作为，以及如何让课程改革与好老师形象变迁形成互动。

沿着历史的轨迹，“反映的实践者”成为新期待

“每一代教师都会面对一个时代对教师使命的新要求。”作者指出，关于什么是好老师，随着时间、文化以及文化内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同时代对于好老师的认定，从源头上影响着如何成为好老师，是我们审视好老师的重要透镜。基于这一考虑，在本书中，作者对好老师形象的研究不仅引入了新视角，还将历史性作为研究的重要尺度。

沿着历史的轨迹，跟随着作者的步伐，可以发现，百年以来，课程概念所指称的事实虽在变化中，但有其轨迹可循。与世界课程走向大体保持一致，我国百年课程概念的发展，主要是把“课程链”从“正式的课程”“一套规范和作为教材的教科书”，延展到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课业，课程作为过程的观念日渐流行，并逐步关注学生学习在课程概念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学生经验的课程”；教师与课程的关系也因而经历了从“教师教课程”到“教师研课程”，再到不断深化“教师研课程”这一趋势。基于此，好老师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演进：处于“教师教课程”的阶段，教师之“教”成为审视课程问题的主要视角，“教书匠”因而成为与之相伴的好老师形象；随着“教师研课程”开始彰显，研究成为教师的一个重要属性，“研究者”因而成为与之匹配的好老师形象；当明确“教师研课程”的最终归宿在于创设适合具体学生的课程，就进入到“教师研课程”的深化阶段，“反映的实践者”也就取代研究者成为新的好老师形象。

对于“反映的实践者”这一新型好老师形象，作者赋予了其本土的内涵：“反映的实践者”通过边行动边反映，强调教师内在力量（反思、意识、经验、信念等）对于改善自身教育实践的价值；与此同时，“反映的实践者”还强调以整体的方式把握真实教育情境中教师的思维和行动，与情境进行反映对话，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也是具体情境的研究者。这恰恰是克服形而上的“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良方，也是“反映的实践者”的本质所在。通过作者的抽丝剥茧，“反映的实践者”这一好老师形象有别于“教师作为研究者”而跃然纸上，成为好老师形象的新期待。

五大机制协同配合，助力好教师的诞生

研究好老师形象的百年变迁，明晰当前的好老师形象，洞察当前好老师形象的形成逻辑，最终目的都指向好老师的培养，这就是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问题。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好老师形象、关键特征（专长）、影响因素、人生经历、成长环境等诸多维度，是一个多维因素互动的结果。我们迫切需要从单一的关键特征（专长）或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走出来，深入探索教师成长机制，这意味着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层次，从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内在动态联系去考察教师成长现象。因此，建立直接指向教师内在专业结构改进、专业发展水平提高的教师成长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正是本书浓墨重彩的部分。

为了深入探索教师成长机制，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反映的实践者”作为参照，通盘考虑上述不同维度对教师成长的意义，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构建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指向“反映的实践者”的教师成长机制模型。该模型使准入机制、渗透机制、动力机制、研究机制、保障机制五大机制相互协调配合，共同促进“反映的实践者”的诞生。首先需要从入门关进行审查，挑选那些适合做教师的候选人进入教师队伍，这就涉及教师培养制度、资格制度、“教育天赋”等方面的内容。对广大中小学教师而言，要迈向“反映的实践者”，尤为需要注重从日常实践中找到成长的动力，无论是国外的研究还是国内的观点，大家都越来越认同一个基本的思想：学校既是培养学生的场所，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地，实践因而成为教师成长的重要渗透机制。有了准入机制和渗透机制，为了加速教师成长的步伐，早日成为“反映的实践者”，动力机制和研究机制缺一不可。动力机制主要解决教师成长的心态问题，而研究机制则侧重从研究的角度加速教师的成长。此外，教师成长为“反映的实践者”，还离不开保障机制，本研究主要从“日常抗拒”的角度对保障机制进行了研究。

通过环环相扣的嵌套分析，这五大要素组成的机制模型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和规律进行了本质还原。一方面，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持续的过程，该成长机制模型对教师的职前培养到职后发展进行统整规划与设计，衔接了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该成长机制模型不仅关注到了教师发展内在因素的变化，还关注到了外在因素的触发，网罗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诸多因素，剖析实现教师专业培养与发展的深层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从整体上关照上述五大机制，“反映的实践者”这一新型好老师形象的诞生指日可待。

（作者系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特色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机制转型研究”［项目编号：BHA210146］成果）

游戏玄学——《庄子》不妨倒着读

单纯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庄子》的字数是比较多的，可谓“体大而思精”。在“孔孟之道”和“老庄之学”这个中华文化道统中讲，《庄子》堪称首屈一指的“鸿篇巨制”，然而，在以“经史子集”为主的“国学”谱系中，《庄子》的注疏却与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宏大的体量并不完全相匹配，古代的注疏和近现代的释读都失之于“贫瘠”。因此，目前由向以鲜、吴西峰撰写，重庆出版社推出的《〈庄子〉倒着读》，既有重新开掘《庄子》思想宝藏之现代价值，亦有别开生面、一洗经典注疏繁乏之释读旨趣，为大数据时代的汉语读者开辟了一条阅读艰涩古汉语经典的鲜活途径，名为“游戏玄学（《庄子》为“三玄”文本之最）”可也。以人类学的眼光来看，游戏精神实为点燃与驱动文明进步的火种与原动力。

顾名思义，《〈庄子〉倒着读》的解读方法不同凡响，绝不可用“倒背如流”相类比。阅读经验中的“倒背如流”只是阅读中的“记忆训练”，并不对文本作知识的展示和思想的发挥。特别是汉语的经典文本，无论其原文写作还是注疏解读，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为“微言大义”，一为“借题发挥”。孔子对六经“述而不作”，庄子以“三言（寓言、重言、卮言）”表达“四达并流”的精神，都是这种风格的写照。基于此，向、吴二位“倒着读”《庄子》有了五个别出心裁的维度：第一，倒着读可以由简易入深奥；第二，倒着读可经由门人弟子而窥探宗师密意；第三，倒着读有“纲举目张”之妙；第四，倒着读更能体现《庄子》一书的思想逻辑途径；第五，倒着读更能调动阅读的激情。历史上经典的《庄子》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上述路径，但是真正“倒着”解读的著作，向、吴二位之作还是第一本。

除了在写作体例上把《庄子》三十三篇的杂、外、内三部分完全颠倒之外，相比传统的“注疏”，《〈庄子〉倒着读》联系了现代生活情势中的信息，将“借题发挥"微言大义”的风格同与时俱进的主旨巧妙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古典哲理与现代人世俗生活的“亲和力”。例如，在释读《让王》时，本书在主篇名下添加了12个小标题——“让位"让地"让君"让势"让财"让食"让赏"让礼”“让官"让心"让道"让名”，并于各小标题下作了结合历史故事和现实社会情势相得益彰的释读，让这些沉重的生活话题显得不那么紧迫和压抑。原本在现实生活中思考这些话题是很费脑筋的，而在本书的叙述中，读者犹如在四川的茶馆中听人“摆龙门阵”，可以带着“消闲”的心境去鉴赏它们。具体到“让君”这一节，“倒着读”对“越人三弑其君”的叙述就比较有趣。这个典故在著名的《庄子注疏》（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中处理得比较枯燥：郭象对其无注，成玄英的疏则比较简略，字数与原文相若，点睛之笔落在“以其重生轻位，故可屈而为君也”一句话上，强调“看重个人生命本身，而轻视生命之外的权位”。这种评价有点儿书生气，而实际生活中，历代帝王都酷嗜权位，将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本书就没有用“重生轻位”的老套结论，而是用了“错枝”这个历史“冷知识”，说越王诸咎的儿子王子搜可能名字叫“错枝”，曾因越国“多次弑君（弑父）”的残酷历史而躲在山洞里，以避王位，最终被国人放火从山洞里熏出来而做了国王，不过一年之后也被杀了。因此，本书评论说：“事如其名：错枝，错枝，生错了枝头！”用这样诙谐的语句评议残酷的权位争夺，确实别具风味。

《庄子注疏》之后，清代通才王夫之的《庄子通》《庄子解》也是屈指可数的“庄子释读”谱系的扛鼎之作，其中最精辟的论断就是——《庄子》书中的最后一篇《天下》“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堪为全书之序例。王夫之可以算是第一个想“倒着读”《庄子》的人。虽然有此洞见，但自己下笔著述时，他仍然因循首尾相接的旧统，未见突破。某种意义上讲，三百多年之后的《〈庄子〉倒着读》丰富了船山先生的先见之明，其价值俱见于“子学”大宗经典《庄子》的创新性释读，诚可期待其于游戏玄学中，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慰藉。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教师读书论坛

从教生涯，总要精读几本书

瞿卫华

从教二十多年，我读过很多书。有些书，匆匆翻过就上了书架；有些书，反复细读，虽然目前也上了书架，但时不时还会想起它们。这些书对我的教育教学确实产生过积极影响，所以每每忆及，总是心怀感激。

第一本当属戴维·伯姆的《论对话》。现在已经记不清是谁推荐我阅读这本书的，只记得“对话教学”是当时语文教学的时髦话题，于是就买了这本书来细读。书中的观点，到现在仍然铭记在心的就是“对话要搁置己见"对话就是共建”。这是我细读的第一本理论书，当初没有任何阅读的经验，于是就采用了一种笨办法：摘抄。我将书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抄录在本子上，没事的时候，还会去读一读这些语句；后来，这个本子丢失了，我又重新抄录了一遍。可以说，对话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我从教之初的语文教学。在课堂上，我非常关注对话过程的“意义共建”，当时还专门研究过好多名师课堂上的“意义共建”，比如孙双金、孙建锋等名师的课堂教学，还曾经写过多篇教学实录赏析。我在教学中也经常琢磨“意义共建”，当时设计并执教了很多课例，并立足对话理论探讨了语文教学中“意蕴重构”的相关策略。应该说，《论对话》打开了我最初的教学视野，奠定了我教学风格的基础。

第二本是孙绍振教授的《文学性讲演录》。这本书，我曾将它翻烂了，最后不得不用一个大蝴蝶夹将它夹起来。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遍并没有真正读懂，不过我没有放弃，而是想了很多办法“逼迫”自己来理解这本书，比如反复朗读等。后来，我采用了“摘抄加批注”的方式来“啃读”，也就是在电脑里建电子文档，设计成固定格式，上面是摘抄，下面是批注，一边摘抄，一边批注，终于将这本书读完了。我按照这样的方式读了一遍，感觉还是比较零散，于是灵光一闪，又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作者的观点提取出来，围绕作者的观点，我再重新写一篇文章，可以引用作者的观点，也可以自己另外收集资料。就这样，我整理了“冰山理论"陌生化表达”等论点，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这样一种以写促读的方式，自然比较“烧脑”，但对于基础薄弱的我而言，竟然对这本书渐渐清晰起来，既弄明白了作者的观点，也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阅读动力与定力，竟像农夫一般将这本书“精耕细作”了一遍。不过，确实得感谢这本书，有了它作底子，解读教材的时候，我才慢慢拥有了工具，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眼光。

第三本是杜威的《经验与教育》。这本书虽然薄，但内涵相当丰富，是杜威晚年“集大成式”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杜威集中论述了他的经验哲学。这本书，我采用逐词逐句的方式，反复阅读了好多遍，也采用了上文所说的“摘抄加批注”的方式，渐渐明晰了杜威对经验的相关界定，也感受到杜威“经验论”对后继教育的深远影响。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杜威经验哲学的体系，我从网上下载了很多研究论文，加以细读后，再与《经验与教育》一书对照着看，读起来有一种互相补充的感觉。当时正值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申报，我准备继续围绕自己以前研究的“儿童智慧阅读研究”申报新课题，却苦恼于找不到新方向。看着正在阅读的《经验与教育》，我突然发现“经验”与“智慧”之间存在着深度关联，一下子想到可以用杜威的经验哲学来指导自己的课题研究，于是就申报了“杜威经验哲学视野下儿童智慧阅读操作体系建构研究”，并获得省级立项。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一直用这本书来指导我的教育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发表了多篇论文。《经验与教育》为我的“儿童智慧阅读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操作指导，让我的研究不断走向纵深。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在教育教学之路上明确坚定地走下去，跟我所精读的这些书有很大的关联。作为教师，真的很有必要精读几本书，为自己的教育生涯打下基础。至于当初为什么会发现并选择这几本书，我想，其中既有一种研究与实践的际遇，也是一种阅读的缘分吧。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副校长）

悦读互动

互动话题：您读过与人工智能或数字教育相关的书吗？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现有的阅读方式产生影响吗？（详见3月13日《中国教育报》第九版）

辽宁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崔廷宝：

人工智能强势袭来的当下，人类阅读方式的选择多了起来。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阅读上的便利，比如搜索功能、简单互动等，但是无论怎么智能，人工智能阅读也止步于创造之边，远离创新之外，其强大的阅读助力更像身边有极大数量、极高效率的书籍搬运工，能够将我们所需要阅读的书籍瞬间运到眼前。同样，人工智能阅读的其他助力方式也是完全依赖网络资源进行的。比如，我们能够了解一部书的概要或者与人工智能互动谈阅读体会，完全是因为人工智能后台的网络资源库中有这些存储，而这些存储的来源仍是人类阅读所创造并输入进去的。从这层意义上讲，人工智能阅读更像人类所面对的一部字典、词典等工具书，或者是一座电子图书馆，只不过查阅起来更快捷些。由此可见，人工智能阅读有其长处，更有致命的短处，那就是它依赖网络和电源生存，不具备人类阅读后所产生的创造和想象的功能。依赖网络化信息存储库的最大弊端，就是人工智能阅读不能进行高质量、高水平的自主创造，即使升级换代，也跳不出简单模仿、复制粘贴、东拼西凑的圈子，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一种阅读辅助工具，不能强迫它做完全没有可能的东西。那种阅读后抒发情感、升华思想、渲染气氛、品味生活、回归现实、享受浪漫等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事情，还是交给阅读后的人类大脑处理好了。

江苏省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教师谷建：

在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如同一股强大的引擎，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其在数字教育中的首要角色便是个性化推荐系统。借助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人工智能能够精准地理解用户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提供量身定制的阅读材料，使用户获取信息的效率和精准度显著提升。这无疑拓宽了阅读的边界，让每个人都能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

然而，尽管人工智能带来了诸多便利，其对深度阅读和批判性思考带来的挑战却不容忽视。阅读的本质是理解和反思，这是人工智能目前难以完全复制的。它可能促使人们过于依赖快速的信息抓取，而忽视了深入探究和独立思考的过程。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和情感共鸣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面对面的讨论和分享能培养出更为丰富的社交技巧和情感理解。

因此，人工智能对阅读的影响是双刃剑。它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效率，扩展了阅读的广度，但也可能削弱深度阅读和人际互动的能力。未来，我们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同时保持对传统阅读方式的尊重和珍视，确保人工智能在赋能阅读的同时，不会失去人性的温度和深度。在这个智能与人文交织的时代，阅读将继续是一种既智能又富有深度的体验。

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宣传处副处长甘正气：

人工智能工具写作的优点主要是速度飞快，很快就能交出全文，而且注重层次性、没有错别字，另外还有如下特点：一是开门见山，没有渐进婉转；二是质朴平实，没有文辞修饰；三是自说自话，没有旁征博引；四是千篇一律，没有个性风格；五是高度理性，没有人类情感。

从人工智能工具写作的特点可以看出，其最大缺点是缺乏文学性，从而缺少可读性，没有修辞是其最大短板，因此人工智能工具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人工智能工具写作速度快、注重层次性、没有错别字等几大优点，让它在应用文写作方面有一定前景。但应用文写作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因此需要更加慎重，目前绝大多数应用文写作的任务还不能交给人工智能工具。应用文写作的首要要求是准确明白，让人一目了然，对于少部分格式非常明确的应用文，例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求非常明确的三种法定公文即“通知"函"纪要”，人工智能工具在经过改进升级后，或许未来可以写出正确率较高的初稿。

（董嘉程 整理）